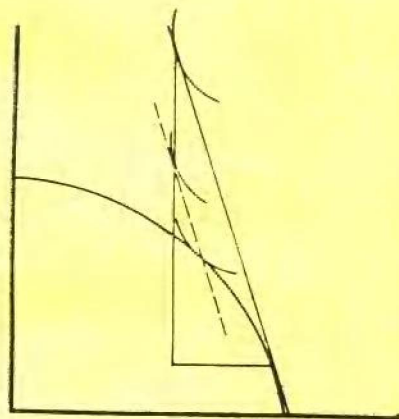


国际经济学 方法论与基础理论研究

贺力平 沈 侠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国际经济学方法论与基础理论

研 究

贺力平 沈 侠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9年·北京

前 言

我们选取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研究方法与基础理论、也即国际经济学方法论和基础理论这一课题进行研究，主要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总方针的确立，我国学者和一般社会人士对了解和探讨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问题的兴趣与日俱增，而国内现有的有关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的著述远远不能满足这些兴趣所提出的要求。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过去我们为高等院校专业教育而编写的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的教科书大都采用描述的方法，即根据机械分类的原则概述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的主要活动和主要现象，很少对这些活动和现象进行理论的分析，即建立起统一的、综合的理论框架以解释这些活动和现象的相互依赖关系，从而掌握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趋势；而要从描述的水平上升到分析的水平，这就需要在方法论上实现一个根本的转折。另一方面，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和教育界开始引进国外有关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的研究成果和教科书，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并使我们的思维或多或少活跃起来；但是，应当坦率地承认，目前我们还没有达到有效吸收国外学术成果的阶段，即还没有能够将国外学者的理论见解、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认同和扬弃，而这就往往导致了两种极端的局面：或者无条件地认同于国外学术成果，或者简单地拒绝国外学术成果。要有效地吸收国外学术成果，包括在批判基础上的认同或扬弃，首先需

要我们确立科学的态度和立场，其次需要我们掌握科学的分析方法。掌握科学的分析方法，意味着我们掌握了进行学术交流或学术交锋的能力，也就会增强我们的科学立场和科学态度。

第二，对外开放的总方针确立后，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迅速提高；对外经济关系扩展到许多新的领域；对外经济活动的方式也日益多样化了。所有这些都显示出我们需要站在新的高度来认识国际经济关系的性质和意义：不仅对外经济活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增大了，而且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对对外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不仅我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而且世界经济发展也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越来越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这些多方面的联系中，产生出了一系列复杂的、将国内经济因素与国际经济因素交织在一起的问题，其中既有许多国外学者已大量研究过的“老”问题，例如国际收支平衡与国内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保护贸易政策对贸易条件的效应等等，也有许多是仅从我国现阶段现实中产生出来的、亟待国内学者加以研究的“新”问题，例如双重汇率制度^①和双重货币制度^②对贸易和收支平衡的影响以及对国内物价总水平和相对价格体系的影响等等。如果说在“老”问题上我们不能照搬别人的成

① 我国曾有过几种形态的双重汇率制度：一是区别贸易结算汇率与非贸易结算汇率；二是官方固定汇率与半官方调剂汇率；三是公开的、限制性的官方市场汇率与地下的、非限制性的黑市汇率。

② 双重货币制度是指境内居民使用人民币，境外居民在国内使用与人民币等值的、限制性的兑换券；而且，实际在国内流通的还有境外货币。

果，在“新”问题上我们更加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研究、拿出自己的成果。我们所面对的现实越是复杂，进行方法论和基础理论研究的意义就越显突出。这是因为，问题愈复杂，我们愈需要抓住问题的关键或者说问题的本质，才能着手去解决问题；而要找出复杂问题的关键所在或本质所在，既不能依靠直觉也不能依靠常识，只能依靠科学的方法或科学的理论分析。凡理论都是对复杂问题的“简化”，这个简化的过程就是抽取出问题之关键或本质的过程。时常有人说，“问题太复杂了，简单的理论没有用处。”这是一种误解。理论有无用处，主要不在于它是否简单，而主要在于它对于所要处理的问题对象是否相关。一个既相关又简单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迅速抓住问题的要害，这对于最后解决问题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当然这还不是全部，但从这一步出发，沿着正确的路线，运用适当的方法，我们可以使简单的理论也逐步“复杂”起来，逐步接近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世界，进而最后解决问题。

第三，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一些重要突破，还有一些重要突破正在蕴酿之中。这些重要突破，无不涉及到国际经济学的方法论和基础理论问题，换言之，即涉及到国际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思路某些重要改变。举例说，传统国际经济学分析均从国际商品交换关系出发，在此基础上进而讨论国际货币关系。这种结构安排的前提在于：国际金融关系是国际贸易关系的派生物。这种格局或者说这种概括，已日益为当代发展中的国际经济关系所改变。现在，国际金融日益脱离国际贸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已完全相互脱离或已在很大程度上相互脱离）。与此相适应，国际经济学研究需要重新确定国际贸易与

国际金融的基本关系。再如，传统国际经济学分析往往将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的不平衡积累视为国际经济结构亦即国际比较优势结构关系的外生变量，从而不能说明国际比较优势结构关系变化的基本规律或基本趋势。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需要对传统国际经济学理论的一些基本前提假设和推导方法进行重新审查，运用新的方法，达到新的认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现在的确非常有必要抓紧国际经济学的方法论和基础理论的研究。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在本课题研究中力图说明国际经济学方法论和基础理论的基本问题，这些基本问题包括：国际经济分析的基本对象或者说基本假设条件，决定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基本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分析国际金融与国际贸易相互关系的基本思路，以及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相互关系、初级产品与制造品的交换关系等等。这些问题是每一部国际经济学论著都必须涉及到的，也是有关国际经济政策讨论中每每涉及到的。这些问题的基础性意义还在于：对它们的理解是我们刻画国际经济世界的基本笔调，离开这些问题，我们无从认识国际经济关系的实质和主线条。

当然，本课题的研究并没有包括进国际经济关系的所有基本方面。而且，我们在这里所报告的研究结果也未采取教科书式的编排结构。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我们提出的这项研究是没有完成的。对我们两位作者而言，我们宁可看成是只不过对本课题进行了初步研究，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果只不过是今后将继续进行的更大范围的研究的起点，这些初步研究成果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和可凭籍的手段。

在本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们曾得到来自许多方面的支持

和幫助，首先我們要感謝為本課題提供資金支援的中國人民銀行教育司，特別是該司的教學研究處；其次，我們要感謝為本項研究自始至終提供科研服務的中國金融學院科研處，特別是該處的楊錫屏處長；我們還要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經濟研究所的王懷寧教授，在研究過程中，我們不只一次地受惠於他的學識和熱情；此外，我們還要感謝其他許多提供了各種形式幫助的同志，他（她）們的謙虛使我們不便在此一一列舉他或她的名字。

在本課題研究的後期階段，我們得到了國家教委青年教師研究基金的支持；這一支持使本課題研究成為基金項目的一部分，基金項目的其餘部分將分階段完成。

賀力平 沈 俠

一九八九年五月·北京

目 录

前言

- 一、经济学方法论的转变及其对国际经济研究的意义……………(1)
- 二、国际经济的基本特征……………(23)
- 三、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原因……………(27)
- 四、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关系……………(48)
- 五、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大国与小国……………(60)
- 六、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关系……………(72)
- 七、初级产品与制造品的交换关系……………(88)
- 八、生产要素配置比例……………(114)
- 九、方法论综览……………(128)
- 十、博弈论与国际经济政策……………(142)
- 主要参考文献……………(149)

一 经济学方法论的转变及其 对国际经济研究的意义

经济学方法论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经济学研究对象认识的不断深化；经济学家从事经济研究的基本方法不断完善或不断转变。经济研究成为一门科学的主要标志则在于：经济学确立了自身特定的研究对象；经济学家从事研究所凭借的手段是符合科学原则的；经济研究的成果对人类行为和政府立法或决策发生了积极而有效的影响。

下面我们略述一下经济学方法论的这两大转变过程。

现代政治经济学概念出现于17世纪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的西欧国家。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克列钦(1575~1622)于1615年发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这是历史上首次在书名中冠以“政治经济学”辞语。孟克列钦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系为区别于“家政学”(home economics)，以专门讨论整个国家的经济问题。在17、18世纪许多重商主

义作者那里，不管是否使用了政治经济学一词，实际上他们都把政治经济学看成是专门探索国家财富增长源泉的学问。而且，他们并未区分科学与艺术，大多数作者都倾向于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各国政府求富治民的管理艺术。

18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法国重农学派将政治经济学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但在重农主义思想家看来，政治经济学仍只是关于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理论的一部分。例如，重农学派代表人物杜邦（1739~1817年）给重农主义下的定义是：“关于自然秩序的科学”。

政治经济学确立其特定的研究对象，首先要归功于英国古典学派的两位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产生和发展的条件，简言之，即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问题。用斯密自己的话说，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家或立法者的科学的一个部门”，它有两个目的：一是“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二是“给国家或社会共同体提供充足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前一部分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微观经济学，后一部分相当于财政学。斯密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解决财富增长的经济源泉问题，使用的方法则主要是微观分析法，得出的结论也主要限于对市场经济本质的理解，例如：“分工规模受市场需求的制约”，“看不见的手”指导生产者与消费者达到尽善尽美的市场均衡，等等。在斯密那里，经济研究首次普遍、大量地运用了供给与需求、成本与收益这些基础概念，从而确定了经济分析的原则。

李嘉图在斯密的基础上进一步限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李嘉图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不是财富的

增长,而是财富的分配。在李嘉图看来,生产是生产者的个人事情,如果情况正常,生产自然会不断增长的;分配则是有关社会成员的共同事情,它涉及到人们的利益矛盾,因而需要政治经济学家的专门讨论。这一倾向在李嘉图的追随者约翰·穆勒那里得到发展^①。穆勒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规律;但是,生产规律主要是“自然的”,分配规律主要是“人类制度的”,所以,后者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在英国古典学派之后,政治经济学关于研究对象的认识又发生了重大转变。如果说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力图研究的问题是“剩余产品的积累和分配”,那么,在边际主义兴起以后,经济学家便将注意力转向了“既定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问题^②。英国边际学派的代表人物斯坦利·杰文斯给经济学所下的定义是:

“快乐与痛苦是经济学计算的究竟的对象。经济学的问题,是以最小努力获得欲望的最大满足,以最小量的不欲物获得大量的可欲物,换言之,使快乐增至最高度”。^③

① 李嘉图之后,十九世纪欧洲工业文明的批判者继承了他的政治经济学主题,并且把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发展成为他们各自的社会哲学的基础。这使得经济学开始对社会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卡尔·马克思是他们中的典型的、并且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位。

② 参见V·瓦尔什和H·格雷姆《一般均衡的古典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1章和第2章。

③ S·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1971年第1版;中译本,郭大力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1页。顺便说一下,杰文斯在书中还倡议用“经济学”一词代替“政治经济学”,“若干小的修正,可以一述者,例如以Econo-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边际分析方法盛行于欧美经济学界，应用边际分析方法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经济理论。例如，将边际分析方法应用于价值问题，便出现了杰文斯、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边际效用论，即认为商品或劳务的价值决定于它对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将边际分析方法应用于分配问题，便产生了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即认为生产要素的报酬分别决定于各自的边际生产力；将边际分析方法应用于交换问题，便有马歇尔的局部均衡论和瓦尔拉的一般均衡论。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方法本身的局限性，边际学派未能展开对生产问题的分析，而且，他们对几乎所有经济问题的分析都是静态的^①。

在19世纪后半期，边际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之间发生了一场方法论争论。边际学派坚持认为演绎推理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并且是符合科学原则的，德国历史学派则认为归纳或历史统计才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并且是符合科学原则的。不过，这两大学派都坚持实证性原则；就这点而言，它们都推进了经济学研究向实用性方向的转变。

20世纪的经济学家极受边际学派的影响，他们中大多数

mics代替Political Economy。我以为Political Economy这一双名是麻烦的，应尽早放弃……我们希望，近年来为法国经济学者称为La science economique的科学，将一律采用Economics这个名称”（“1879年再版序”，前引版本，第6页）。自杰文斯以后，经济学一词流行起来。

① L·帕西内蒂《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1章，导论。帕西内蒂在书中指出，自“边际革命”以后，西方正统经济学家只注意静态的交易分析，忽略了动态的生产问题的探讨。产生这一现象的历史原因在于世界贸易的增长先于世界工业化的到来。

人进一步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限制在目的与有限手段之间的关系上。正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罗宾斯所说：“经济学是研究目的与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这些手段可以有不同用途”。罗宾斯认为，以往的经济学家常常将许多不属于经济学对象的事物也纳入自己的著述中，例如关于人类或人类社会的目的及其评价问题。罗宾斯明确指出：“人类目的本身，并不是（经济学）主题的组成部分。经济学不研究技术的和社会的环境”；经济学本质上是“研究稀缺物品的分配”。^①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为经济学所下的教科书式的定义承袭了罗宾斯的主张：

“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作出最终抉择，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利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来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它分析改善资源配置型式所需的代价和可能得到的利益”。^②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当代经济学家普遍重视实际经济问题的研究并积极从事政策建议、论证或评价工作。经济学家进行政策评价时，通常要解答这几个问题：（1）政策的目标是什么？（2）所建议的手段实现或能够实现这些目标吗？

（3）实施政策的直接成本有多大？（4）所建议的手段是否有副作用？（5）还有另外的较好的替代手段吗？^③简单地

① L·罗宾斯《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伦敦，1932年第1版，第16、38页。

② P·萨缪尔森《经济学》，1976年第10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5页。

③ R·G·利普塞和P·O·斯特纳《经济学》，1981年，第6版，哈泼·罗伊出版社，第12页。此书原名《实证经济学导论》。

说，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就是比较既定目标的价值与相应手段的成本。这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原则或基本方法。这里，应当注意到经济问题的本质与经济学分析的本质之间的区别。经济问题的本质：为人和社会所欲求的商品或服务无论何时何地都是稀缺的，因为生产这些商品或服务的各种要素也都是稀缺的；一句话，稀缺性是经济问题的本质。经济学分析的本质却在于：在资源稀缺的制约条件下，人们仍有进行不同抉择的可能，每一种抉择都具有程度相异的正价值（目标满足的程度）和负价值（手段的代价），因此，综合比较各种抉择的正价值和负价值才能为抉择者提供合理的决策依据；一句话，抉择的比较价值分析是经济学的本质^①。

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严格限制在抉择的比较价值分析方面，既缩小了经济学家的研究范围，也扩大了经济学家的研究范围。从缩小一面来看，这一规定排除了许多不属于经济学家应当关心的问题。例如，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哲学价值之争，显然不应看作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过去有许多经济学家参与争论，实际上是越出了本职领域。从扩大一面来看，这一规定把许多原在经济学家视野之外的问题也包括进来了；

^① 日常生活中存在着一种对经济学本质的误解，即认为经济学分析的本质在于“通过一定手段争取最大成果”。如果说经济学家的工作不过是在既定的单一目标约束下寻求成本最低的手段，那么，经济学家的工作完全可以交给有关的技术专家和会计师去做。事实上，社会需要经济学家，乃是因为只有经济学家才胜任对诸种目标的价值与负价值进行综合比较的工作。正如哈耶克指出的，“通过一定手段争取最大成果”往往是从工程师的观点看待经济分析工作（参见F·A·哈耶克编《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伦敦，1936年，导论）。

按照这一规定，凡是在人们进行抉择的场合，都有可能对之进行经济学分析。这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所说：

“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不应局限于物质产品和欲望，或不应局限于用货币进行交换的商品市场，并且在观念上不应区分决策的大小、轻重，或不应区分‘感情上的’和其他方面的决策。的确，我认为，经济学研究方法提供了应用于分析一切人类行为的结构——即应用于分析各种决策类型和从生活方式到人格品性的结构”^①。

对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基本方法论的理解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地理解抉择的比较价值，往往只关心目标和手段的直接经济价值或负价值，即可度量的、以价格为统一尺度的并需支付或可收取的那些变量。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家主要从事的研究工作即为此类。广义地理解抉择的比较价值，那么除了经济价值之外还需要考虑到政治的和文化的价值因素，这些非经济的价值因素有时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有时却不能转化为经济价值；而且这些变量发生作用的方式可能不是直接的，常常是间接的。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突破对经济学本质的狭隘理解，以及从更加宽广的制度和观念背景来理解人和社会抉择体系的变迁^②。

① G·S·贝克尔《家庭经济分析》，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1页；另参见同一作者《分析人类行为的经济学方法》，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6年。

② 这也就是自70年代初以来在西方学术界盛行的“政治经济学复兴”运动。现代政治经济学不仅在名称上与经济学有别，而且在内容上也有显著不同。参见E·勒尔《政治经济学的复兴》载E·魏尔怀特和F·斯蒂威尔编《政治经济学文选》，第1卷，悉尼，1976年，第4章。

上面概述了经济学方法的历史演变过程，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基本特征。根据我们的概括，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包含如下几个要点。

(1) 假定所有人或所有经济活动者都具有理性化的经济动机，即无一例外地都追求个人消费效用的极大化。19世纪后半期英国著名经济学家F·埃季沃思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这一点：“经济学的第一原则就是每个人都仅受自私利益的驱动”^①。这一原则可以有几种表现形式：消费者在预算约束下追求各种可消费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佳组合；消费者作为生产者或其他有偿劳动的提供者，追求收入的极大化；资本所有者或经营者追求投资收益或利润的极大化。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追求效用或收益极大化的动机可能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甚至以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但经济学分析必须从这一基本前提出发，否则无从说明经济活动的目的性。从而失去对目的与手段关系的判断依据。尽管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动机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例如追求名誉地位或天生具有公而忘私的精神，但他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所具有的动机显然有别于从事其他活动时所具有的动机。也就是说，“经济人”不同于“政治人”、“文化人”或“宗教人”等等。经济学家做出这一假定，还有一个依据，就是：人的各种活动选择并不是杂乱无章的，或者说是由各种短暂的怪念头支配的，相反，人的活动选择是一组有序的行为，即人们总是需要吃饱。

^① F·埃季沃思《数理心理学：论数学在道德科学中的运用》，伦敦，1891年，第16页；转引自A·K·森《选择、福利与测量》，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84页。

穿暖后才能从事其他社会文化活动；这种有序性决定了经济活动先于其他活动，经济动机是各种动机中最基本的。不仅如此，这种有序性还体现在各种经济活动之间，例如，消费先于储蓄，食品先于家用电器，等等。经济学家从效用或收益极大化的前提出发并遵循有序组合路线，便得以揭示人类活动，尤其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结构关系。

(2) 假定投入与产出之间具有函数关系。人所欲求的是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产出，而一切产出都需要有相应的投入。在经济计算中，产出是目标价值，投入是手段成本。在既定的制度和技术条件下，产出是投入的函数，用公式表示就是 $P = F(i_1, i_2, \dots, i_n)$ 。这种生产函数是根据既定的制度和技术条件下每种投入要素的正常效率而得出的。这一关系式决定了在既定的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增加产出所必然受到的投入要素的制约。换言之，生产函数还包含了某种类似于物理学上的物质守恒定律的投入产出转换关系。正是受到投入产出转换守恒规律的制约，经济学家的分析工作只能沿着这两条路线展开：一是改变制度和技术条件，使投入的产出效率得以提高，即建立新的生产函数；二是在不降低人们的现有消费水平、不降低现有投入的产出效率的情况下增加投入，即提高储蓄倾向或加速积累。

(3) 假定竞争是社会经济各个参与者之间的基本关系，包括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消费者之间的竞争，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竞争，以及各个要素所有者之间的竞争，等等。尽管在效用或收益极大化原则中包含了人的各种活动和所需商品或服务结构有序性，但基本结构有序性这一特征并不排斥诸种要素及其产品之间在满足人的需要上具有相互替代的可能。而且，经济学家正是通过说明这种相互替代的